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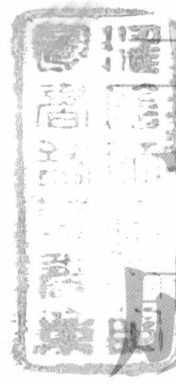
于成龍集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1398126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于成龍集

李志安 主編

山西古籍出版社



淮阴师院图书馆 139812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成龍集 / (清) 于成龍著; 李志安主編; 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點校.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 6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 - 7 - 80598 - 873 - 3

I. 于… II. ①于…②李…③閻…④蕭…⑤趙… III. 政書 - 中國 - 清代 IV. D 691. 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88527 號

于成龍集

著 者: [清] 于成龍
主 編: 李志安
點 校 者: 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
責任編輯: 落馥香 李永明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 - 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綜合辦)

E - mail: sj@sxpmg.com

網 址: [thhp: //sjs.sxpmg.com](http://sjs.sxpmg.com)

經 銷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新華書店集團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25. 75
字 數: 500 千字
印 數: 1 - 3 000 冊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80598 - 873 - 3
定 價: 120. 00 元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馬大正 于沛 朱誠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陳樺

鄒愛蓮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于成龍集》編委會

顧問：薛延忠 劉澤民 金道銘 胡蘇平 高建民 楊安和

郭海亮 張平 令政策 薛軍 姚新章 閻愛英
姜新文 孫躍進 聶春玉 董洪運 張九萍 張陸緒
徐改清

主任：聶春玉

副主任：董洪運

委員：岳培民 薛萬明 朱錦平 丁雪峰 李志江 劉明勇

吳志國 王琦 劉保明 呂改蓮 曾廣超 李秀峰
張中生 成錫鋒 王盛章 成星明 李志安 武中平
郭潤保 王若東 王月明 劉俊祿 林祥

主編：李志安

副主編：閻鳳梧 趙桂溟 馬俊梅

成員：蕭泰芳 李豫 張志華 倪瑞星 劉春麗 張瑞雪

宋建軍 張亞平 王衛中
點校：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

于清溪公遺像



巖正性螭，邀風挺不淫不屈之氣，染貞
特立獨行之心，骨堅脊采於保殘磨險之地，
滕仔肩於遺大投艱之中，蓋張忠定之不飾
玩好，魯簡肅之行，履忠傳，散簡之遇人，以
誠范忠文之中，無弗容公殆各兼其歟，而古
人與同，余更欣瞻其貌而如見其衷。

沁州吳琬拜題



康熙本《于清端公政書》

于清端公遺像後吳琬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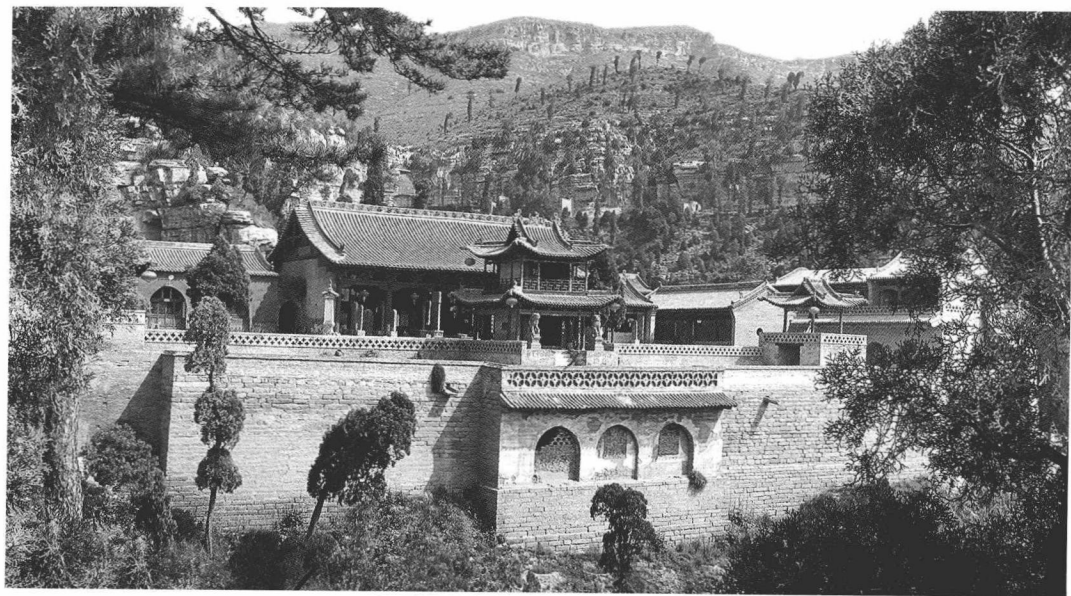
于成龍故里——山西省方山縣來堡村全貌



康熙皇帝手書賜匾——高行清粹（拓片）



乾隆皇帝手書賜匾——清風是式（複製）



于成龍少年時代讀書處——山西省離石區安國寺



廣西羅城縣于公舊治摩崖石刻



于成龍詩碑（現存山西省平定縣固關村）

凡 例

一、本書《于成龍集》原名《于清端公政書》，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于成龍長孫于準在于成龍門人李中素編輯之《于山奏牘》基礎上擴充、抄錄，蔡方炳、諸匡鼎重新編次、校對，分爲首編、政書(八卷)、外集，此謂康熙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成龍曾孫于大樞增刻續集，連同康熙本原版重印。鑒於《政書》第八卷爲《吟詠書》，收錄詩、詞、散文，與“政書”之名不甚相副，且于成龍之名較之于清端公更廣爲人知，故本書改稱《于成龍集》。

二、本書用康熙本及其續集作底本，原書序、跋、卷、集、附錄、補遺等編排順序，一如其舊。《四庫全書》錄入《政書》八卷，名爲《于清端政書》，其餘未收，且有篡改、刪節、書寫錯訛以及漏收文字，本書僅作參考，不作校本。惟《政書》第八卷《過虞姬墓》其二末句“空令死血舞紅妝”中之“死”字，依四庫本改作“妃”字。

三、本書增補于成龍撰《建宋賢祠引》一篇，編入《政書》第八卷《吟詠書》之末；其他與于成龍有關之史料三十篇、詩二首，編入本書增設之“新補”中，均注明出處。新補文字大致按文章類別與寫作年代編排，無寫作年代者，按其所在之總集版本年代編排。

四、《于清端公政書》首編有目錄，《政書》目錄分別列於各卷之首，外集、續集無目錄。本書統一編目，置於全書之首。

五、短篇一般不分段，長篇適當分段，以便閱讀。

六、爲適應普通讀者需求，本書斷句從短，標點從細。公文輾轉、人物對話，以及專用詞語如“三舉卓異”、“奉公奏最”、“苟四知之克嚴”之卓異、最、四

知等等，一律加引號；概述大意、引文不全者，不加引號。各級官署、官職名稱如“州縣”、“州府”、“部院”、“督撫”、“司道”、“廳縣”、“衛備”等，非事有專指，一般不用頓號隔開。文中夾注，另加標點。

七、依照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作通則》之要求，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俗體字（含與今之簡體字相同者如于[於]、決[決]、爭[爭]等），以及一篇之中一字而多體者，一般不作改動；偶有改動，以不發生歧義與異音為準。對少數民族之污衊性稱謂，為保留歷史原貌，不作改動。

八、避諱字、缺筆、添筆，以及音義、筆畫相同，而上下、左右結構不同之異體字，改為通行字。

九、錯字加圓括號，隨後之正字加方括號。校補缺字用方括號，衍文用圓括號。本書此類情況顯係誤刻、漏刻，極易辨別，對理解文意並無大礙；且在本書內大多可以互證，閱讀同類文字，即可一目了然，故不必再作校記。如“彭百（鈴）[齡]”、“鮑世（榮）[庸]”、“衛（濟賢）[既齊]”、“順治十（三）[八]年以副貢知羅城縣”、“期七（日）[月]起事”等等，均屬此例。原文殘缺處，用□表示。

十、《于清端公政書》中之幾篇序、跋，以及“新補”中錄自各種文獻之若干文字，原書無題者，本書視文意擬加題目；有作者姓名者，列於題目之下，以便檢索。

十一、《于清端公政書》首編“恩賜宸翰”之後，有“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臣于準敬錄”字樣；《政書》各卷之首，有“後學平江蔡方炳、西陵諸匡鼎編次，冢孫于準敬錄”字樣，因序跋中已有說明，故不保留。

十二、于成龍畫像與畫像背面之吳璵題辭，原在《于清端公政書》卷一之前，本書移置於全書插圖部分。

十三、本書增補文字取自正史、方誌、總集、文集、碑刻，以及于成龍後人所作，非信實可靠者蓋不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年間東亞書局印行之《于龍判牘》，而書中作者簡介却為于成龍；主編襟霞閣主、加評秋痕廬主，均不知何許人；案件情節與判詞，不見有關史料；判詞文體多為華麗駢文，與于成龍質樸文風大相徑庭。此書疑為書商為牟利而託名于成龍之偽作，故不收錄。

十四、《凡例》有所未盡者，分別見於本書中編者按語。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采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

* 戴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教授、博導，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

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爲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折、錄副奏折。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

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斗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分，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常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序 一

薛延忠

巍巍呂梁，人杰地靈。數千年來，在這塊古老的黃土地上，孕育和涌現出無數志士仁人。被清康熙皇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于成龍生于明清更迭之際，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目睹明王朝的腐敗，親歷苛政戰亂加之於民的災難，形成了“積極入世、潔己愛民、伸張正義”的獨特性格。從順治十八年（1661）起，于成龍歷任縣令、州、府、道、布政使、巡撫、總督、尚書、大學士等職，為官二十餘載，治下政績頗佳，深得士民愛戴和朝廷賞識。

于成龍以“民”為社稷之本，深信“國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時刻把民生疾苦、地方利弊放在心上，“期以興利除害”，傾力安民惠民、消弭內憂外患；以“廉”為官德之首，仕官數十年如一日，清心寡欲、淡泊自甘，“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以“實”為從政之要，講求“立誠”、反對“作偽”，常微服潛行，訪民間疾苦；以“嚴”為治政之綱，要求屬下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嚴其守又察其所守之真偽，勤其政又訪其敷政之寬嚴”，其治下“官吏望風改操”。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龍因積勞成疾，病歿于兩江總督任上，遺物“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康熙帝聞訊痛惜“朕失臂矣”，并親撰碑文稱為“清端”；江南百姓“巷哭罷市，家繪像以祀之”。

李志安同志組織編校的《于成龍集》一書，較為詳盡地收錄了于成龍的政

* 薛延忠：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書、詩詞、碑記等珍貴史料，以厚重的筆墨展現了于成龍求學、立德、從政的一生。它的付梓，對我們重溫歷史、認識先賢、做人從政，均大有裨益。

古人講，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鏡，可以知興衰。于成龍作爲封建社會的幹吏名臣，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所處時代和階級的影響與局限，但他在修身、安民、治政等方面的諸多理念和作爲，仍有許多值得今人學習借鑒之處。在當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深入推進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調”的重要指示精神，繼承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學習借鑒先賢前輩的情操修爲，進一步強化黨的宗旨意識，堅持以人爲本，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謀；堅持求真務實，勤政奉公，扎實工作，努力創造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政績；堅持廉潔自律，修身立德，以對黨的無限忠誠，對人民的深厚感情，對事業的不懈追求，篤行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之要求。

是爲序。

二〇〇八年五月